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名人
書系

谈友情

邓九平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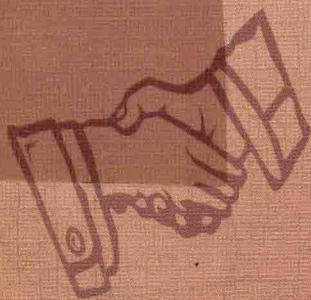
名人
書系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 下 ·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邓九平

主编

谈友情

下·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名人
書系

金 岳 霖

——我最“老”的“老”朋友

于光远

◆ 于光远 · 金岳霖

1996年7月间,在北京举行的“金岳霖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我得到了一本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一看书名就可以知道书分作两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别人写的回忆文章、传略和大事记,第一部分九十页是金岳霖自己写的。金岳霖 1895 年诞生,1984 年去世时九十岁。他的这些回忆文章是 1981 年到 1983 年,即八十六岁到八十八岁在病中断断续续写的。共写四十九篇,可是只用了九十页篇幅,平均每篇不到两页,但很具体生动,把他的主要经历、他的社会交往、他的学问、他的思想演变、他的性格、他的特殊爱好都描绘出来了,读起来很有味道。前些年我动过写一篇回忆金岳霖的念头,但一直没有动笔。得到那本书后,读了他写的这些,促使我提起笔来。

(一)最“老”的“老”朋友

前一个“老”说的是相识的时间之早,后一个“老”说的是在我的朋友中他和我的年龄差距最大,如果他还活着,现在有一百多岁了。

我和金岳霖相识的时间是 1933 年,离现在有六十三年了。我认识他时,我是十八岁,他是三十九岁,他的年龄是我的年龄的一倍还多三岁。

我们怎么会相识？说起来真有点特别。

那时我在唐在章家做家庭教师，教这家的三个孩子。大的刚上高中，小的才进初中。有一个星期天上午是我给他们上课的时间。我到他家后，孩子们的妈妈对我说，今天你能不能给孩子放假？有一个我们家的朋友来，小孩子要和他一起玩。你也别走，你和他也可交一交朋友。

是个怎样的朋友呢？

他来了。高高的个子，穿了一套颇为讲究的西装，戴了一副墨镜，头上还戴着一顶遮太阳的鸭舌帽。见面时，女主人介绍他和我相互认识。她对我说：“这是清华大学的金岳霖教授，大哲学家，才从北京来。”又对他说：“这是郁家哥哥，小孩子们的老师。别看他年轻，可有学问呢，他也喜欢哲学，将来也许会到你那里当教授。”两个人一握手，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这天我们一起玩。先是去打网球。我不会打，坐在一旁喝咖啡，跟最小的孩子东讲西讲。打完球在那个挺高级的俱乐部吃了西餐后，又一起去了他的寓所。他有一个哥哥在上海，他住在一间客房里，房间里一个藤制的书架。我望了一下书架上的书，全是关于打桥牌的。在这之前我真不知道关于打桥牌有这么多的学问。

他是到上海来过暑假的。我们是初次见面，不好意思向他请教什么。我看出他和唐在章家的人很熟。不久前，他刚去美国休假了一年，讲了不少见闻。小孩子们，还有我，听了津津有味。我对他的印象很好。那个星期天就这么愉快地过去了。开头女主人向他介绍我之后，我真有些怕他考我这个“未来的清华哲学教授”。还好，他只去给小孩子们讲这个讲那个，不想考察我的“学问”，审查我的教授资格。

这回我在《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中看到一篇他写的回忆。文章的题目很怪：《在北京，车是极端重要的》。文中提到唐在章在北京的家里很可能有一辆汽车。里面写他和唐在章

“这一家的朋友关系长了”。在他的这篇文章中不但写到唐在章(当时是外交部的一个小官),写到唐在章夫人(就是介绍我和金岳霖认识的那个女主人),也特别写到他家的三个孩子(也就是我的三个学生)。他写道“唐家有三个小孩,大姐、二哥、小‘老薛’。为什么叫‘老薛’?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现在我和‘老薛’仍然是隔些时总要见几次面的老朋友。她曾说我是她最老的小男朋友,我听了高兴极了。”在这篇文章中没有讲他同唐家是怎么熟起来的,只是讲他和小孩子们友谊,说“友谊的开始也很特别。小孩总是要听故事的。我那时能讲的故事最方便的是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这可合他们的口味。我没有记住讲的次数,总是不少的。”

唐家的三个孩子我都挺喜欢,尤其是那个小“老薛”。我教她“四则”和“小代数”时,她只有十二岁,是个十分可爱的小姑娘。金岳霖也一定很喜欢她。我在纪念金岳霖百岁诞辰的会议上得到他写的这篇文章后,打电话给“老薛”。她告我还没有这本书,我向哲学所要了一本,请她到我家来把这本书拿走了。

现在我说金岳霖是我最老的老朋友,除了第一次我同他见面时“老薛”的妈妈当时所作的介绍外,还有两个根据:一个是1934年我转学清华物理系三年级后,常去论文导师周培源处。一般每月一次。每去,周师母总留我在他家吃饭。有一次吃饭时金先生去了。周先生正想告诉他关于我的姓名时,金说不用了,我们早就是老朋友了。“老朋友”三个字是他自己说的。还有一个论据是,他同“老薛”是朋友,而“老薛”又同我是朋友,我也就是他的朋友。金是逻辑大师,对我这么推理,一定认为不合逻辑,但我认为这个推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二)古典式的家庭和爱情故事

1934年我到了金岳霖教书的清华读书,俩人在同一个校园里却没有往来。我没有选哲学系的金先生的课。那时清华物理

系的课程很紧,我又对抗日工作很积极,还要在城里一个中学教书赚钱,我实在太忙了。

在清华我听到了他和林徽因、梁思成的故事,我听到的故事非常简单,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金岳霖的情操品德“真高尚”。这回得到那本书,看了金岳霖自己写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也看到林洙写的《金岳霖、林徽因、梁思成始终是好朋友》,他们三人间的关系就知道得很清楚了。

金岳霖的文章把三人间的亲密关系作了简单的、纯粹外表上的描述。他用“打发日子”来形容他长期不成家的寂寞生活。讲他和林徽因、梁思成抗战前在北京、抗战中在大西南、抗战后又在北京一直住得很近或者就住林梁家里的情景,又发挥了对“爱”和“喜欢”这种感情和感觉。而金与林徽因梁思成之间的关系,其实许多人都知道,金因和林徽因的相爱,又不能结成夫妻,终生不娶。林洙在其文章中写道:

“我曾经问起过梁公,金岳霖为林徽因终生不娶的事。梁公笑了笑说:‘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间,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

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他们三人间的关系真有点儿像西洋古典小说里的故事。梁思成、林徽因去世之后，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一直同金岳霖住在一起。金最后住在干面胡同中国社科院宿舍，住的时间很长。

(三)建国后金岳霖哲学思想的转变

同在清华两年，我没有去打搅过他。抗战八年、解放战争四年，更没有同他有任何接触。光阴荏苒，到了1948年。建国初期，有好几年很少去清华北大，又一直没有见到他。由于我一直在党中央宣传部负责联系理论和科学方面的工作，需要了解了解学者——不论是自然科学家或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的状况。特别在1954年遴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期间，我需要对我国学术界的著名人士进行多一些了解。我也问起金先生的思想政治状况。多数人讲他思想能跟得上形势，但还有一个人说了一些不那么好的话，说他在建国后，经常作“深刻”的检讨，有些过分，对别人的批评也偏左，有言不由衷地应付局面、但求过关的表现。说他的这种作法使别的学者被动，别的学者心里不满意又不好说，等等。我相信这位同志讲得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我对金岳霖从来就有很好的印象，我不信他会有任何在认识以外其他不纯的思想。

于是我就找了几篇他新写的文章来看。看了之后我完全肯定他是一个只服从真理、勇于自我批评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历史唯物主义，他能在这一点上想通了，接受了，就应该承认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自己的《回忆》中，他写道，自己“在政治上追随毛主席，接受革命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

历史唯物主义,现在(指1981年到1983年写《回忆录》时)仍是如此。”建国初期,我在中宣部管政治课学习。那时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看到共产党取得了全国的胜利,非常想了解是什么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这么伟大的胜利。大哲学家金岳霖我想也是其中一员。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从前接触到的各种哲学体系“都远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明”。他的这个看法也曾经对我表示过。不过也许有人会说,“他有可能想到你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而且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中管理论工作和社会科学的干部,他给你说的话未必是他真实的思想。”可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冯契在自己的回忆中,也写道:“金岳霖即使在私下里也表示自己从前的哲学体系远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明。”冯契的话作为证据,力量更强。还有一件事,是倪鼎夫文章中写的,1958年金去英国访问时瞻仰了马克思墓地,同时也看了斯宾塞墓。斯在19世纪在英国影响很大,著有三个大部头著作和十卷本《综合哲学》,在当时英国的思想界俨然一个巨人。金岳霖在访问时对一起去的人说,马克思生前名声并不大,留下了《资本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学说越来越焕发出夺目的光辉。而思想巨人斯宾塞就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从他的这一番感慨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深处。

可是我在1954、55年看了他新写的文章后,给我一个印象是,他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时间毕竟不够长,又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加上他经常接触到的是在高等学校中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据我所知,那些人中的左倾思想对金也产生了影响,因而还没有做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深更全面的认识。因而他有一些不恰当的看法,但这完全是他出自真心,没有见风使舵,人云亦云的因素。因而他写的东西是用自己的真实思想、用心写的。他做的那些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自我批评和对那种哲学思想所作的批评中有不少是经过他思考得出的很有价值的论点和证据。

他的哲学思想又有他不愿放弃的东西。他在《回忆》中写的那篇讲自己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还特别表明在宇宙观方面“我仍然是新实在主义者”。

(四)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

这也许是牛顿的真实故事。他家养着大猫小猫各一,房间里应该有洞让猫出入。据说大科学家牛顿(也可能是有人编造出来的)竟提出挖一大一小两个洞的方案,忘了小猫也可以从大洞里出入。这说明大科学家也会犯常识性的错误,传为笑话。金岳霖在他的晚年也有类似的笑话,从这些笑话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

有一件事是我在《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中黄集伟写的一篇短文中看到的,文章中写道:

“某日,梁先生见其厨师外出采购,手捏一张数码为五千余元的人民币活期存折,惊疑不已。找到金先生问其缘由,金先生答曰:‘这样方便。’梁先生曰:‘若不慎遗失,岂不枉哉?’金先生依旧说:‘这样方便。’梁先生说:‘这样吧,存个死期,存个活期,两全其美——而且死期利率高于活期……’谁知金先生连连摆手:‘使不得的,本无奉献,那样岂不占了国家的便宜?’梁先生无奈,只得为其细述储蓄规则多项。述毕,金先生满脸欣然,停有片刻,说:‘你真聪明。’当然,最终此事亦非就此了结。‘改存’之日金先生几欲打退堂鼓,理由是他预备在自己死后留一千元钱酬谢厨师——‘如果将剩余的钱都存了死期,万一某日我突然死了,钱不就取不出了?’这回梁先生不能不笑。笑罢,梁先生又将如何将那一千元酬金抽出为厨师另立户头之类细细讲演一番……末了,金先生重又孩童般喜作一团——‘你真聪明!据悉,梁先生自金先生口中很赚过不少如是之褒奖呢。’

金岳霖一生未娶,雇一厨师,他不把自己与厨师的关系视作简单的雇佣关系,厨师也帮助金做其他家务。金竟想到从自己

死后留的五千元的储蓄中取出百分之二十给厨师表示感谢也表现出金的为人之道。

还有一件事也是黄集伟文章里写的。

“另有某日，伏天，数位友人同往金先生舍下闲坐。一进门，便见金先生愁容满面，拱手称难：‘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友人既不知何事，又不便细问，但念及‘金老头儿’独身一人，不便诸多，便作英雄状慷慨允诺。俄顷，厨师为来宾每人盛上一碗滚沸的牛奶……英雄言辞尚余音缭绕，无奈，只得冒溽暑之苦，置大汗淋漓于不顾将碗碗热奶一饮而尽。谁知几位不几日再次光顾，重又承蒙此等礼遇，且金先生口气坚定，有如军令。事隔有旬，好事者向金先生问及此事，方知原来金先生冬日喜饮奶，故定量可观；时至盛夏，饮量大减，却又弃之可惜，故有‘暑日令友人饮奶’一举。也许金先生以为订奶有如‘订亲’，要‘从一而终’，不得变故。殊不知奶之定量增减有尽由主人之便的通例。当友人指点迷津甫毕，金先生照例回赠那四个字的赞许：‘你真聪明！’”

金先生晚年还有趣事，这件事虽然同大洞小洞的故事的性质不一样，我也想附带写一下，那就是金岳霖坐板车到王府井一带转悠的事。这件事当时我听人向我详细地描绘过的。对这件事在黄集伟文章中有一段叙述：

“……金先生患有青光眼疾后，常就医于‘协和’。‘文革’伊始，‘革命派’不许金先生用车。金先生闻讯问曰：‘停用专车可以，可我怎么去协和看大夫？’‘革命派’答曰：‘给你派辆排子车吧！’在‘革命派’来说，此为戏言？揶揄？抑或是推托之辞？不得而知。反正金先生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每于就诊之日，准时自携一木制小马扎，端坐于平板三轮车上，任人一路踏过去，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

汪曾祺在回忆金先生时，也写了金先生深居简出，当他想看看外面的风光时，就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人约好，常常坐这平板车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

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有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五)后悔没有向金岳霖好好学习

建国后金岳霖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之后,我在中宣部负责联系中国科学院。“文革”前我还是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并且在所内还兼任自然辩证法组组长、哲学刊物的编委。我和他是哲学界的同行。在某些哲学组织中常常都有我和他的名字。“文革”后,他和我都在社会科学院,我们又认识得那么早,许多年来,我和他的寓所很近,他住的那栋宿舍楼,从我的南窗都可以望得到。我也有时到他住处去闲聊,既讲过去也讲现在。在他写的《回忆》中,有些故事曾同我讲过。他还讲过在清华他与侯德榜一起参加的一次考试。考官点名叫到某人考中允许出国留学时,这个人就要大声说“有”,像个军人那样。他讲这个故事时就大声用湖南话喊了一声“有”,那时他的神情声音似乎就在眼前和身边。可是我一直没有认真向他请教问题。

我也是一个爱好哲学的人,我也知道金岳霖有许多独创的见解。我回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会不向他请教哲学。想清楚了,根本原因是,没有好好读他写的书。他的红封面的那一本《逻辑》,我曾经读过一部分,可是没有读下去,隔了一段时间就忘了。他的《知识论》,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时,曾经作为批判资料(用了一个客气一点儿的名称“参考资料”)印出来之后给了我一本(不是正式出版物,没有封面,厚厚的一本)。我翻了一下,觉得这本书的分量不轻,也并不好懂。我一直想好好地看一遍,却没有下决心拿出这个时间来。事先没有看,我就不敢向金先生请教。没有看他的书,问题提不到点子上,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一次一次拖下去,因而始终没有好好谈过一次。

放着一个大哲学家在自己身边不请教,在他去世后就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今年春天开纪念他的百岁诞辰的会时,会议

的组织者要我讲几句,我认为自己也应该讲几句,应该对我后悔没有向他学习这一点进行反思。我认为写关于金岳霖的纪念文章就应该对他的哲学观点进行评论。我知道金岳霖的脾气,最好能和他讨论,甚至争吵一通他就高兴了。学者最怕的就是文章发表了没有人看。可是我不但在他生前没有那么做,就是到了他百岁纪念时我还未能做到。在这个会上发给我的书只有一本《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许多他的学生和朋友写的文章不少,介绍了他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成就,相比之下我就很惭愧。大会上要我讲话,使我后悔自己这几年把当面请教的这么好的条件丧失了,而且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去年他的弟子,也是我的好朋友哲学家冯契逝世。我也没有来得及向他请教哲学问题。我在《文汇报》上写的那篇《怀念冯契》也未能评论他的哲学思想。我在金岳霖百岁诞辰纪念会上请哲学所的负责同志帮忙找了四大卷《金岳霖论文集》,还是想找时间好好读一遍。

记胡耀邦好学不倦二三事

耀邦好学是我亲自和他接触中所观察到的。

我和耀邦认识得很早。在延安时就见过面^①。但成为朋友是从1975年我们一起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反对“四人帮”,后来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起挨批受整开始的。

① 前天为了查一下材料,在1939年9月8日的延安《新中华报》上看到一个关于在延安举行了国际青年节纪念大会的报道。在这个大会主席团十多人的名单中,有胡耀邦也有我。那一次台上一定见过面。可是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早已完全消失了。我只记得在延安见过他,但记不起是在怎样的场合。

1976年9月,“批邓”正处在紧张阶段,唐山地震涉及北京,使这个运动暂时中断,整人的和挨整的人,都忙于防震,我们这样的挨整的人却因此喘了一口气。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富强胡同六号耀邦家串门,看到他在家中读书的情况,对他的好学有了深刻的印象。

不妨对他那时读书的环境作一些描绘。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但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很坚实的木头做了一个像双层床那样的东西。躺在下面,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砖瓦檩柱直接压在身上。这样办公室也就临时成了卧室。而他就在这样的一间房子临窗的一张办公桌旁学习,桌上有摆着的书,同时也总有打开着的正在阅读的书。

我去他家,两人免不了要发泄一通对“批邓”的不满。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们的身边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讲话毫无顾虑。幸而也的确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这样的话说不了几句也就完了,见面谈话后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论问题上去了。

记得第一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摆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提到“科学是生产力”的这个论点所根据的就是这本书。不过起草那个文件的事情早已成为过去。“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早就把这个《汇报提纲》定性为“一株大毒草”。我就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科学院有人说他把“科学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看一遍。说罢就问我的看法。这本书我是研究过的。于是我们两人把书中直接有关论述找了出来。我记得主要有这样几条(这次写文章查对了文字):

——“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

——“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当然还有别的。我们一起研究了这本书之后,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写“科学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

这是有关“运动”的一件事。

又有一次见面谈的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那一部书是马克思的笔记。其中有一篇马克思写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已经出了单行本。在这篇《导言》中,马克思讲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者之间的关系。耀邦见到我兴致勃勃地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讲得非常之好,他特别注意到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同1975、1976的那场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也很重视。后来,1979年耀邦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时,我想起了那次谈话,使我明白,他那样做,是他本人读书联系实际的一个结果,是有理论思想做指导的。

地震期间的这两次谈话使我注意到耀邦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

后来,我又去了几次富强胡同^①,我们见面从来不谈工作上

① 耀邦当了总书记后搬进了中南海,但是他这座中南海的房子很特别,不是什么这个堂那个堂。不知道中南海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不大像样的房子。没有大厅、没有一进、两进的四合院,而是若干个耳房连在一起的一个院落。不知道以前这些房子是给什么人住的,他搬到中南海后我从来没有再到他家去过,因此没有问过为什么看上了这个地方。我想可能有一条,那就是这个院子在南长街会计司胡同有个大门,有人要找他,可以不必经过中南海东南西北几个警卫森严的大门,这是个与中央领导人接触和同群众接触都很方便的住所。耀邦逝世后我第一次去会计司吊唁,他的灵堂设在那里。

的事,总是闲谈。一次他正在看一本薄薄的册子。我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递过来一看,是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问他这本书写得怎样,他说“挺有意思的”。回家后我就找来这本书,很快就看完了。这是吉田茂对日本近百年来发展历史的一个概括。正如耀邦说的那样“挺有意思”。其中有几点我记得很牢。比如在讲人口问题时吉田茂讲了一个观点:只要是人才,就不怕人口多。我认为讲得很好。书中还讲日本非常重视教育,学校工作得到优先的考虑,谁要去日本农村,在农村中看到哪一所房子最好,不必问一定是学校。94年我对中国人口问题发表一个见解“质量第一,教育第一”时,我又想起由于耀邦推荐而我阅读的吉田茂的这本书。

这个事例,使我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

还有一次也是在他家里,见到桌子上打开着《淮南子》。他看我注意这本书,就说古书中有些话讲得挺有意思,他说《淮南子》有一句话“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接着发挥了一通治小与治大、治家与治国所用的方法不一样的道理。他还特别写了那个笔画很多的爨字,说这个字不简化,印成比较小的字笔画就很难看清楚。那时我在研究“信用”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性问题,回来翻了翻《淮南子》,发现在“泰族训”和“诠言训”中有意思相同的两段文字。如果抛开一些难认的字、难懂的文言句子,意思是明白的,治大治国不能采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烧多少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办法,而要想办法解决国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我认为这一句话可以借用来发挥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经济,不能只看手边有多少钱去办多少事,而要经过仔细研究确定可以达到的发展目标,借助于信用这个手段,想方设法去找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钱。通过耀邦引用《淮南子》这一句话的事,我又看到他还重视古籍,能够古为今

用。

这样的事很多,是写不完的。以后有机会再写吧!

对耀邦好学,了解的人很多,许多老同志对他这一点很赞扬。陆定一就是其中一个。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去北京医院拜望我们中央宣传部这位老部长。他对我讲:“毛主席的错误,党中央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之批评了。我的错误也大着哩,没有人批评,只好自己批评。建国后,我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应该提出在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领导干部,凡是没有大学毕业的,统统要进大学,读到大学毕业。那时大多数人年纪还比较轻,书还读得进去。如果那时我这么做,党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议,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场文化大革命也许可能避免。可是我没有提出这个主张,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罪名是“贻误国家大事”。后来再提也没有用了。岁数大了,学不进去了。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只有极少数老干部觉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夫,刻苦学习,有很大长进。这样的人中第一个就得数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陆定一的这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关胡耀邦好学的几句话,同我亲眼所见,完全符合事实。

1994年12月5日

田家英的悲剧

听说有好几位同志写了怀念田家英的文章,也许已经出版

了这方面内容的书。不过我至今一篇都没有看到。在延安有两个田家英,我说的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很长时间的田家英。当过中央组织部的那一位,早已不用这个姓名。

我也想写写田家英。我写的内容,肯定与别人的不同。因为我没有同田家英一起参加过党中央最高层次的、如1959年在庐山开的那样的会议。我也没有同他共同参加过某个中央文件的起草。我记得他曾经找过我,要我做过两三件事,大都是毛泽东关心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要他特意来问问我的。但是一件也记不起了,想必是不很重要的。我和田家英的接触可以说大都是非工作性质的,但是我和他很熟。在我面前讲话也许他认为是最可不必顾虑的人之一。在他心目中,我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人。尽管我爱讲、爱写,但是他相信我懂得什么可讲、什么不可讲,懂得讲各种话的分量。相信我不会给他制造任何麻烦。还有一条当然是更主要的,那就是我们谈起话来很投机,彼此有气味相似的地方。一个人总希望有几个可以随便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发泄自己感情的“朋友”。

如果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也许会先从他在四川一个中药铺当小伙计时如何从钱箱中偷钱讲起。田家英告诉我,他偷钱的办法是“就地取材”。药铺有的是黏性很强的膏药,他就把膏药抹在竹竿上,从钱柜的缝里伸下去,粘到钱往上提,不论硬币纸币都可以取出来。讲这个故事,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对死者的不敬,但是我认为田家英自己并不隐讳讲这些事情。一个年轻人给老板捣捣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故事可以表现出那时的田家英是一个又聪明又调皮的青年。

如果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也许会再讲他怕蛇和有点像蛇的动物,连听都怕听。你告诉他这本书上有蛇照片,他就连打开这本画册的胆量都没有。如果你把蚯蚓之类的东西放在他前面,他会吓得逃跑,我觉得这时他真像一个小孩子。有一次几个朋友给他恶作剧时,他已经二十六岁了,当时看到他“脸无人色”